

從「50年不變」到「識變、應變、求變」（上）

摘要：本文指出，回歸後「50年不變」被社會奉為評價發展的最高準則，雖有助於在主權更替中穩定人心、維持香港獨特制度與生活方式，但也在無形中強化「向後看」的思維：社會菁英與輿論以「不變」作為標準衡量新發展，容易美化過去、滋生懷舊與戀殖情結，削弱對未來的想像與改革的動力，令香港逐步失速並被鄰近城市超越。文章指出本土關懷若缺乏建設性引導，可能走向排外民粹，甚至滑向分離主義。最終在2019年社會風暴中推向激進化，迫使中央出手穩定局勢，揭開以「識變、應變、求變」為主調的「第二次回歸」。改革成敗仍取決於特區政府與社會精英能否提出清晰目標與路線圖、凝聚共識、並有能力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

作者簡介

宋恩榮教授

宋教授是經濟學者，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之滬港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經濟研究中心副所長、經濟系客座教授、眾多國際經濟學報的編委成員。他曾獲頒中國經濟學領域最高榮譽獎項之一的孫冶方經濟學獎（2008）及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2009）。研究專長為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及中、港、台三地之投資及貿易。他擁有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經濟學哲學博士學位和香港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

宋教授亦是政策企業家，一直不遺餘力參與政策研究工作。他除擔任未來經濟學院高級顧問外，亦是民智行動設計智庫董事、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政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紫荊研究院名譽高級研究員和香港文化協進智庫學術顧問。



從「50年不變」到「識變、應變、求變」（上）

原載於《明報》

日期：2024年9月5日

在香港回歸後20多年的一段長時間，「50年不變」被奉為金科玉律。當時社會擁抱「50年不變」的價值觀，社會菁英及輿論往往以過去的「不變」的標準衡量新發展。社會精英習慣向後望而非向前看，黃金時代永遠在過去而在將來。結果是整個社會缺乏對未來的願景，也難以塑造未來。香港的發展由是漸漸失速甚至停滯，本港競爭力也被鄰近大城市超越。

今天在中央督促下，「識變、應變、求變，透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的調子高唱入雲。如果「50年不變」是「第一次回歸」的標誌，相信「識變、應變、求變」下的改革將會成為「第二次回歸」的主旋律。

「50年不變」是一國兩制方案內的重要方針與承諾。因篇幅所限，本文會分為上、下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50年不變」的承諾對香港發展的影響；第二部分會分析「識變、應變、求變」所需的改革將會面對的困難及阻力，並會討論克服這些困難的辦法。

「50年不變」承諾的功與過

「50年不變」，從字面意思來看，是一個相當奇怪的承諾。現代社會瞬息萬變，「50年不變」怎麼說得通？況且從共產黨人信奉的唯物辯證法來看，事物恆常變化是辯證法的核心；「50年不變」不但有違常識，也違反辯證法原則。

或許我們不應從字面理解「50年不變」的主旨，而要從香港當年回歸的歷史背景探討



未來經濟學院：為香港未來培育政策企業家
Hong Kong Future Economy Institute: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for Hong Kong

3511-6752
info@hkfei.org.hk

九龍觀塘偉業街133號12樓RD13
Room RD13 12/F 133 Wai Yee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50年不變」的涵義。當年香港發展水準遠高於內地，大部分港人長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對接受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統治，有根深柢固的恐懼。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承諾長期維持香港的獨特生活方式不變，對穩定人心有著重要的作用。

歸根究柢，香港回歸涉及主權變更，是「改朝換代」的大事；「改朝換代」而沒有「人頭落地」，歷史上極為罕有，說明「50年不變」的承諾功不可沒。套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名言，無論「50年不變」的承諾是否合乎常理，能捉老鼠的貓便是好貓。

不過，「50年不變」的承諾也帶來不少弊端，例如社會的精英及大眾容易美化過去的港英時代，也會鼓勵極端的懷舊思潮。「不變」的惰性更會成為社會進一步發展及改革的阻力——當社會菁英及輿論不斷以過去的標準評價今天變化，便欠缺對未來的想像，也難透過改革塑造將來。

懷舊熱潮、戀殖情結及本土主義

回歸後不少港人都認為，過去的港英時代是黃金時代。在「50年不變」成為衡量社會好壞標準的情況下，這是自然的結果。筆者在1960年代末期進入大學，學時曾參與社會運動，領教港英政治部多次粗暴幹預，不會天真地歌頌當時的「言論自由」。不過對港英時代沒有切身經驗的年輕人（即回歸後長大的一代），卻容易一廂情願地美化港英時代；後來更進一步發展成為戀殖情結。

黃金時代既然在過去而在將來，回歸後懷舊熱潮的興起，完全可以理解。懷舊思潮並非香港所獨有，也不是回歸後才出現。不過香港的懷舊熱潮不僅在回歸後迅速壯大，更以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方式爆發，例如2006到2007年發生保育皇后碼頭的運動及衝突；運動更出現一些不切實際的極端倡議，例如「原址重建皇后碼頭」的要求。

筆者不否認皇后碼頭是港人集體回憶的一部分，皇后碼頭與大會堂及愛丁堡廣場是一個統



一的建築群，有一定保育價值；不過在中環填海無可避免的情況下，筆者認為最理想的保育方案，是在拆卸碼頭時盡量保留碼頭部件，填海後另覓地重建碼頭。這也是政府當年回應民間保育要求的建議。

可是當時不少人卻要求在填海後的土地上「原址重建」皇后碼頭。這個要求可謂莫名其妙，因填海後碼頭原址會變成公路和陸地，並非在海邊。「原址重建」皇后碼頭的結果是，碼頭會變成一個公路旁的涼亭，根本沒有碼頭的風味。是以有部分運動人士進一步倡議「原址重建」後在「碼頭」旁建造人工湖，頗有「陸上行舟」的想像。總括而言，「原址重建」皇后碼頭的種種倡議不但技術上難以實行，也難以保存碼頭的海港風味。

保育皇后碼頭的社會運動，並非香港回歸後最龐大的民眾運動；如何保育一個碼頭，也不會影響一般民眾生活。作者深入分析這個運動，是因為有關保育的討論集中反映了社會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及未來，例如是否迷戀過去及忽視未來；況且參與這個運動的人，不單止包括素來較為激進的環保團體，也包括不少知名的專業及文化界人士。

何以當時會有這麼多團體、社會菁英及立法會議員堅持這些「陸上行舟」、違常的方案？是否因為從「50年不變」的原則出發，需要在填海之後面目全非的「原址」重建本來拆解的建築，才能符合「不變」的要求？

保護本地文物的運動，也滋長了本土關懷。愛護本土的情懷，本來可轉化為建立社會的力量；遺憾的是當年香港的本土主義，卻向極端方向發展成為排外的民粹運動，後來甚至成為分離主義及「港獨」。

2016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訪問香港時特別談到「本土」議題。他說：「月是故鄉明。鄉土情懷人皆有之。我是東北人，我愛我的家鄉；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香港同胞對自己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的珍視，理應得到尊重。事實上，一國兩制的一項主要內涵，就是保持香港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高港生活方式』度自治，這就是對香港『本土』實際情況的最好照顧。」



張德江的話，是勸告也是警告：一旦本土主義發展成分離主義，便會動搖一國兩制的根本，對香港十分危險。可惜言者諦諦，聽者藐藐。當時保育皇后碼頭運動及本土主義孕育出來的年輕泛民領袖，完全漠視張德江的警告。當年戀殖情意結更與民粹式的本土主義結合，成為香港激進化的助燃劑；加上2019年時特區政府未能適當回應群眾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憂慮及恐懼，結果爆發出社會風暴。

2019年的社會風暴，參與人數眾多，其中包括不少沒有政治背景的年輕人。他們上街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不當權者處理民眾示威的手法，與分離主義未必有關。可是群眾運動難以避免「鬥激」的「廣場規律」。運動的方向漸漸被少數激進份子騎劫，泛民老一輩的領袖被視為落伍，運動蛻變成難以控制的怪物。結果最後由中央出手穩定大局，開啟了以「識變、應變、求變，透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為標誌的「第二次回歸」。

由治及興 不能單靠中央「落單」

從一國兩制框架出發，香港「由亂及治」主要是中央的憲制責任，中央政府透過訂立《港區國安法》及改變政制安排達到目標。不過，「由治及興」卻不能單靠中央「落單」，還需要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精英主動及積極參與。

中央已經「落單」要求改革，唯改革能否成功，還要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及社會精英的膽識、洞悉力、判斷力、毅力、魄力及領導能力。改革者需要洞悉現存弊端，建立準確的改革目標和可行路線圖，設計合適的改革方案，並且能凝聚社會共識，能夠團結社會各界的改革力量，克服既得利益的反對及阻撓，才能成功完成改革。

因篇幅所限，本文的上半部到此為止。下半部將討論改革為何總會面對強大阻力，例如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者（包括商鞅，王安石，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及「六君子」等）大部分都因既得利益的反對而沒有好下場。最後將從古今中外的改革經驗，總結如何克服反對並成功推行改革的各種方法。





地址 九龍觀塘偉業街133號12樓RD13
Room RD13 12/F 133 Wai Yee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852) 3511-6752
電郵 info@hkfei.org.hk